一、长歌浩浩

尽管我们已经过了崇拜武侠英雄的年龄，但我们对于武侠英雄还是始终感兴趣。这种兴趣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它的强度与性质呈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对于武侠这种杰出人物的言行有着天然的亲和。但是，中国之侠，起先是断然难于登上历史沉重的大书的。似乎谁也难说清楚，究竟自何年何月起，侠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视线里。或许以往人们关注的只是那些在沙场上征战的猛将军人，而对同样有着身先士卒，浴血厮杀，济贫扶危，以暴易暴，置生死于度外献身精神的侠客武士们，却视而不见。侠客英雄只在老百姓的梦中英雄气短般地被人遗忘。这不免有点太不公平了。

近十几年来，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正引起人们的的重视：武侠文化与英雄复归成为新的热门话题。武侠小说虽然基本上是一种市民文化——尽管许多文化人并不愿意承认喜欢武侠小说，并一直将武侠小说排斥在文学圈子以外。而北大人却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金庸先生和他的武侠小说，并将其列入中国现代十大文学家之列。甚至，成为北大的客座教授。显然，金庸的小说里决不仅仅是打打杀杀，那里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可我要问：为什么武侠小说会有那么巨大而持久的读者市场？武侠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正以一种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文学形式，顽强地存在于我们的市俗社会中。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风趣地称武侠小说为“成人的童话”，这是不无道理的。答案很简单，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一样，有一种代偿作用，能在虚幻的意义上，满足我们的一些愿望。如超越自身体能的愿望，除暴安良的愿望。人们对锄强扶弱的英雄侠士是十分敬仰的。

武侠，是武侠文化的源泉。武侠军事文化，应该说包含着武侠人物、武侠文学和武侠伦理、军旅文化四个部分。武侠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军事现象。武侠通过行侠仗义来实践着武侠伦理，武侠文学则口述和笔传着武侠事迹，表现和总结升华着武侠伦理。武侠文学则又影响和规范着后世武侠的行为，反映出武侠的每一个特定的时代。而军人生活与征战厮杀本身就具有武侠人物的传奇意味。

然而，中国历史上真实的侠客究竟是以怎样的军事活动来纵横驰骋的？中国古代文史中的侠客形象是以怎样的军事行为及面貌表现出来的？这正是这本小书所要探究的。或许，本书能用拙笔将中国武林侠客的军事文化现象勾画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一）武侠探幽及游侠的初始形态

既然是对武侠文化探幽，那当然要对历史上的侠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行。“侠客”古今皆没有规范统一的定义，但大体包括所谓的“侠”、“游侠”、“任侠”、“剑士”、“剑

客”、“刺客”等。

在中国历史上游侠其实是很难概一而全的。这是因为历代以来，游侠在不同的时代显示着不同的特征，如两汉游侠、唐代豪侠、宋元绿林、明清帮会等。

历史上，试图给侠下一个完整定义的人很多，但大都不得要领，局限在一个方面，无法全面整体地说明侠的这种社会行为。

刘若愚先生的说法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

《说文》写道“侠,俜也。从人夹声。”创字之初，“夹”字是写作“夾”的，这形状像人肋下的衣甲。而且，夹、甲二字音近，在秦汉书中常相通用。可见，侠是带甲之士，亦即武士。

《说文》又说：“俜，使也。从人，粤声。粤，侠也。”段玉裁在《说文注》中注释：“今人谓轻生曰俜娉命，即此俜字。”俜命之俜，今字记作“拼”。由此可见，侠士也就是拼士。

“武”字指军旅于戈之事。而我们的古人造字之初为它赋予的却是“止戈”的要义。可见，那个时候的侠士带甲拼命而搏，只是为了实现和平。其心其情足以令今人叹服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武侠军事文化是以侠客义士的行为来唱主角的。而在诸多的古代文献中，虽“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没有“武侠”这个词。最早将“武”与“侠”二字合二而一、相提并论的却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韩非子。

侠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的大乱之时。那时，政局多变，社会动荡，篡窃、弑逆、兼并已经不少，文人学士人心浮

动，儒、道、法、墨各派五花八门的思想纷纷出现，各有一套治愈社会混乱的药方。儒家提倡恢复传说中远古圣王治理社会的德治；道家推崇无为而治，要求取消一切社会制度及政治；法家则强调以法治国，主张用惩罚来制止犯罪；墨家宣扬非战和兼爱。这些思想忙于争论，都想让社会秩序沿着自己设计的轨道前行。

战国时代，随着奴隶主统治秩序的破坏，兴起了一个游侠阶层。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不受国籍和世俗等级身份的约束和影响。他们无恒产、无固定职业、也不从事工商和农业生产，但他们是有文化、有武功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在乱世之中，超脱存在，是介于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人。

这些浪迹天涯的江湖中人，由于自己无法从事具体生产，便只好投靠别人，或作食客、或作死士。虽人数很少，但他们身怀武艺周游列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急人所难，扶强抑弱。他们带剑长行，奔走四方，择主而事。以至于为他们所忠于的主人看家护院、保镖行刺，直至随军出征打仗。

而此时的游侠，则横空出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灵魂直接将正义、道义、侠义付诸行动。只要认为有必要，就不在乎是否合法礼，就敢于动用武力。他们不是官而敢操生杀，不是隐而不仕朝廷，他们节义过人、功力超人，赢得民间社会的肯定和赞许。

武侠大都身怀绝技、武功高强。他们四海为家，云游四方，敢于冒险，主要专事“私剑”即暗杀活动。并且有一种与官府法令相违背的价值标准和自由理想。向往行动上的独来独往和心灵上的宽松自由。

韩非则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指责他们逞勇嗜杀、目无法纪，是国家的五种蛀虫之一，也是六种“奸伪无益之民”之一。他在（五蠹）中竟给“侠”安上一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罪名。这也难怪他给侠下的定义是：“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可见，侠与儒在那时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侠这一类人多是以他们行为的特别，而被世人格外关注。

韩非将“弃官宠交”、“肆意陈欲”、“以武犯禁”归结为侠的三大特征，倒也没错。但是，那时的侠客义士并非以仗剑动武为惟一要件的，他们其实更重“仁义”二字。其行为、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他们身在江湖，不大听从朝廷政令，不为朝廷所用，心中只有朋友义气；

他们浪迹天涯，侠行乡里，仗义疏财，救济他人，也按自己的性情，纵欲享乐，随心所欲，不拘礼法，不受约束，逍遥自在；

他们讲的是以武力捍卫自由，意气交合，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良心；

他们的身上有一种伟岸挺拔的豪迈气概和人格力量。重名重义，一诺千金，轻死轻利；

他们是又讲义气又霸道的家伙，他们是有势力、作威福、讲义气，称雄一方、名满天下的豪杰枭雄。

先秦之时，好剑之风形成一股浓烈的文化氛围。对于武侠这一专门的武士阶层来说，他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因为侠是隶属于士的阶层的，侠士可以带剑，也可以动武。这就给了出身于平民市井、卿相贵族的游侠以纵横腾挪的疆场。于是，私剑模式即私人武力，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游侠的一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形式和一大特色。

侠的这种大开大合的江湖豪气，为大众广泛神往，却又不是人人皆可为之的，这就更加增加了侠的神秘色彩。

侠是一种理想，一种行为，更是一种蕴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为着属于自己的公道和正义，行剑攻杀，快意恩仇，横行长街，剧饮豪赌，藐视名利，放歌山野，浪迹天涯，傲然天地。

“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以义行侠，以侠成义的品格和理想，正是武侠中人的人格意气。这种绵延千年而不断不散、愈烈愈浓的武侠文化，不仅依旧大放光芒，而且更加激起我们的血性豪情。

他们做事当然有自己的规矩和立身原则。为什么有人将侠与刺客并举呢？刺客报恩以武，不顾生死；游侠施恩以仁，便是超道德行为了。两者虽然都重然诺，轻生死，但二者立身行事的动机是不同的。最为有名的便是那些为报知遇之恩，而充当刺客，奋不顾身行刺主家仇敌的侠士。这些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于“报”，而后才是武。为了达到目的，动用武力，只求速战速决。

其实，这种心态之下的侠士、刺客，以及不计终极结果的军事行动，怎么说也是种“水漂”之作。你看——

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侠客，是鲁国将领曹沫。他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为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对其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德有恩，岂可不报？

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为公子光以“善客以待”，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能让人家如此看重，怎不奋身以报？

豫让变易容貌，狙击赵襄子，是因为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其报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之时，屡次声言要“报”燕太子丹，但一直推三阻四，迟迟不动；以至无辜连累了诸多人白白送掉了身家性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沦为天下人之笑柄。他不是流传了千年的大英雄吗？尽管荆轲在秦廷之上有勇有谋、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义无反顾，堪称勇士。只可惜他学艺未精，武功太差，又不讲刺剑之术。图穷匕首见之后，只好一味地胡乱冲杀。无奈他怎是秦始皇的对手？“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可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难成大事，令人慨叹。

游侠横空出世，便迎来群雄争霸的大好局面，这是他们纵横驰骋的社会大舞台。游侠这种独特的社会角色，便从此开始凝聚和生长起来，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二）诸子百家论游侠

时空造就了侠在中国历史上的光芒。侠义之士在2000多年间汇流成一种不断不散、愈烈愈浓的自由与兼爱之河。纵观历代巨子对侠的评估，侠便在这条河上显示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轨迹来。

不知当年诸子百家有意还是无意，对“行剑攻杀”的侠，总是有那么点不大公平。按刘若愚先生的归纳，侠与儒、道、墨三家的关联是最紧的。当然，游侠与诸子百家都有些瓜葛，但它却不属于任何一家，他们既非知识分子，又

非政治家，只是一些意志坚强、恪守信义、愿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出生入死的人。中国之侠的成长，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算是顺应了历史大潮之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江湖世界。

1. 儒与侠的兼容与排斥

就侠而言，最初是与士相提并论的。地位的平等，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面对不同的文化传统。

应该说侠士所继承的是史前英雄时代的尚武精神，而儒士却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他们都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中国古代的所谓“士”，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士志于道”，它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道的维护者。侠和士一样，没有恒产，没有什么凭借，唯一所依的只是他们的知识和武功。这个阶层潇洒、飘逸地如此孜孜于道，积极参政入世，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超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可以临危不惧、临难不苛，百折不回。以极大的期待呼唤着理想的到来。

传说孔子是有武功的。据说他能够达到“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但开创儒学的孔子，是不屑于动武的，他瞧不起武夫。儒家反对暴力，却不是出于胆怯。而是极重视武备，他常教育自己的门人，“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

在这种尚武精神支配下，孔子为儒士注入了一股侠气。古代儒士从事的“六艺”就包括射和御，另四艺是礼、乐、书和数。六艺精通才算是合格的士。可见那时的士，包括孔子在内，同样有着一副健壮彪悍之躯。而后来，儒士们的那

种弱不禁风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形象，是疏于搏射造成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儒士都是如此。

儒家反对侠士运用武力，其思想学说与侠士看重气节、主持正义有相合之处。儒家代表了绅士的道德观，游侠代表了平民的道德观。但就其本质来说，二者都是相同的。两者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儒士与侠士，都把名誉与信守诺言，看得比财物和生命都宝贵。因为在一些侠客身上，已经融合了侠的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的品德，又体现出了儒家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处世风度，折射出他们入世报国、追求理想的高风亮节。

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弱、政归诸侯、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在这乱世之际，孔子忧心忡忡，坐着牛车，带着弟子，辗转古道，奔波往来于鲁、卫、郑、曹、陈、蔡等国，走遍了中原大地，到处游说，谒国君，会权要，宣扬其政治主张和学说，虽然到处碰壁，但仍不改初衷。这和侠的行为品性极为相似。

孔子兴儒，弟子三千。他死后，儒子又衍为若干派，其再传弟子乃后世儒者，很自然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与道、墨一样，儒也仅仅是一种学术派别而已。但他们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宣扬其社会理想，就需要有一种侠肝义胆的侠士介入，才能付诸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侠士加入到儒学门派，则是很正常的事。不是就有一种“侠出于儒”的说法吗？子路人孔门之前，便是仗剑浪游的侠士。孔子当然很高兴地为他“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使“天下人皆曰孔子能止暴营非。”

儒家就是这样矛盾。他们看重侠的刚毅勇敢的品性：

“士可杀不可辱”。孟子则进一步推崇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和中国大侠所遵循的最高境界，保持了天然的一致。孔子的弟子颜渊重名轻财、子路殉身取义，既表现出了一个侠士入世报国、从容不迫应有的风范，又可算作是儒家行侠的典范了。

当然，儒与侠的区别总是有的。总而言之，他们对“义”与“仁”的理解是各自不同的。孔子主张“仁政”、“攻心”、“化性”。侠却管不得那么多了，真可谓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婆婆妈妈，心慈手软。儒倡导“三纲五常”，并认定侠的所作所为往往是过了头，超乎了对他们的奢求。儒家认为仁爱与责任是分等级的，必须把父母放在首位，孝比抽象的正义更为重要。而侠则认为，仁爱、正义、道德和责任对自己的亲人与陌路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儒家觉得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去死，那他如何向自己的父母交待呢？

侠慷慨大方，甚至于自我牺牲，但儒家看来这是过分，不符合“忠孝节义”的行为规范。

儒家提倡礼让、讲究秩序，认为个人有必要统一于固定的行为模式中，服从于家庭；而侠则注重复仇，他们生性傲慢，因而不肯随便屈从于人，对自己的行为外表常常显得漫不经心。

儒与侠的这种差异，与其说是社会地位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各自的天然气质所然。儒代表了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观，侠则代表了平民百姓的道德取向。也可以这样说，前者恪守中庸、适合时宜；后者却个性鲜明、反叛放纵。

2. 墨与侠的天然一致

侠的某些行为准则影响着作为士的阶层的诸子百家，而

墨家却与侠的处世行事，保持了天然的一致。

墨家“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虽然有“侠出于儒”之说，但是韩非却也认为“墨”即是“侠”，“侠”是由墨子一派人物转变而来的。韩非何出此言，下此结论？照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思想概论》书中的分析：“墨之徒党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巨子死而遗教衰，其党徒乃渐服于其为游侠之旧。高者不过能‘不爱其躯，以赴士之扼困’，而不尽‘轨于正义’。下者则并不免‘为盗跖之居民间’者矣。”这当然可以算作是“侠出于墨”的另一种说法了。

墨家对侠的出现充满了同情和好感。事实上，墨家思想对侠的行为影响甚大。侠者素有“别墨”之称。处于春秋战国之时的墨子，是主张赖其力者生的。他为了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的社会抱负，将其三百弟子组成了一个敢于赴汤蹈火、急人所难、死不回头的勇士队伍，所司职业便是专门帮人打仗。墨子为首任“钜子”，（这大概有如江湖帮会的帮主吧）墨子死后，其继承者孟胜名为“巨子”。

《吕氏春秋》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卫他的封地，结果失利，为尽墨家之义，自尽而亡。而随他而死的弟子则有185人。这个故事很是悲壮。巨子孟胜与其说是个墨者，不如说他是位坚守信义的大侠；而他的那群弟子，与其说是一墨家信徒，不如说是一群豪侠义士。简直就是一支“敢死队”。你看，他们为了取信于天下，而集体自戕，正是绝对忠诚、足以依赖、重然诺而不爱其躯的侠义行为。

如此看来，墨家实际上就是一个侠士集团，他们不计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标。这种不怕死、敢于牺牲的精神，与侠客轻生救人、刚勇无畏的雄风是浑为一体的。可以这样说，墨家学说为其后继者们滋养了一身侠气。

有众多学者都不同意“侠出于墨”的说法，刘若愚先生就十分谨慎地说战国以前的专职武士的道德准则既影响了游侠，也影响了墨家。冯友兰认为墨家就是由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组成的。

当然，两者的相似我们还是承认的。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热衷于利他精神，乐于帮助人，都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两者都绝对忠诚，永无二心。墨家的弟子，都出身寒苦的下层庶民，他们与侠一样代表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实际上武侠精神也因为墨家的影响力，而广泛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形成平民社会的侠义传统，也多了一分军人色彩。

墨家的内部结构是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有严格的家规，纪律严明。而侠只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有松散的联系。墨家“巨子”对部下有生杀大权，视墨者之法为“天下之大义”，且高于国法。即使是亲人违犯，也一概不赦。这与侠客遵守江湖帮规而轻视皇法有共同之处。

墨家弟子生活简朴律己，墨子就教弟子穿短衣草鞋，以自愿吃苦，严于律己为高尚，并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大禹为榜样。而侠客却生性自由风流，以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作为处世准则，他们向往任性散漫、无拘无束、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而缺少独立的信仰。

墨子主张把主持正义的权力，托付于“天”和“鬼神”，他们虽然也为弱国的自卫而战，但在本质上是非战的，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侠却主张恩仇必报，时时准备争斗。总体说来，墨家关心政治和社会平等，讲治国之道，而侠只讲

个人主义，不过一夫之勇。

3. 道、法等杂家对侠的熏陶

道家与侠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联系的。道家哲学的某些方面与游侠的气质是相吻合的。这表现在道家追求个性，否定社会制度的约定，反对暴力。庄子崇尚自然，不拘小节，以避身于山野为乐趣。他们的信仰，实际上遵循的是顺其自然的原则。这显然与侠不受世俗与礼教约束，敢于对抗统治阶级而逍遥法外的追求是相一致的。道与侠都无视官府和法律，取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态度。这种对法律控制和政权的反感一拍即合。

但是，自古以来，自命清高的道家历来看不起混杂于游民之中的侠士。庄子在《说剑》中，把剑客描绘得十分狼狈。面对社会现实，道与侠的处世观便相对立起来了，道家推崇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行为规范，而侠却刚猛好斗，命定要在一生一世中有所作为；道家寻求的是纯粹的精神自由，而侠客寻找的却是社会大自由，希求在现实中获得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道与侠的冲突，说到底是古代知识分子与平民意识的冲突。

有意思的是，道家理论中的玄学部分是游侠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后来的武侠小说中却有不少道教人物充当着武林主角。如张三丰、丘处机等。

当然，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最为活跃的除了儒、墨、道三家之外，还有法、名和阴阳三家。

法家其实与侠的差异很大。法家倡导国家至上，以法为天，强调吏治，反对“行剑攻杀”的侠，对侠基本持仇视态度，韩非便为侠判了“死刑”；而侠却看重个人自由。法家

力图用国家权威去维持社会秩序，侠却大不敬于政府官员。法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凡事必须严格执法，违法必究。这就给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理解，留下了很小的空间。而侠大都是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法律角度来判断是非，他们的正义感是建筑在人类的同情心之上的。

总的说来，法家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立场出发，侠从平民角度出发，来看待社会。难怪二者会格格不入。

与此同时，以惠施、公孙龙为首的名家，巧舌诡辩，玩弄文字游戏的空套路，其行为准则与以武功和剑术来对抗社会的侠是不相关的。

那么，以邵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又如何呢？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是受“五德终始”规律支配的。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倒是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奇门遁术有很大启发，使武侠功夫走得太近奇幻和神秘了。

兵家孙武也反对游侠私斗拼杀的现象。他更多地研究了各种排兵布阵之法和武术技击之能。他亦非常重视奇兵而后战。他看重的是千军万马的大兵团作战阵法，而不是匹夫之勇。

统观诸子百家，与侠都有点瓜葛。但是，侠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家。说到底，侠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他们的侠义理论并不完整，只是间接地汲取了儒、道、墨等几家思想的一小部分，并在他们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形成了自己处世的独特的行为准则与规范。

他们一诞生，就和统治阶级相对抗，而且也与诸子百家的基本要义相悖。他们的确是以武犯禁，素被统治者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然而，不论侠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如何，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客之流与具有江湖帮会性

质的墨者之徒，对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侠义观念的形成与深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军人的那种勇猛无畏的铁血性格之养成，都影响甚巨。

(三)司马迁为刺客与游侠列传

西汉武帝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游侠盛行的时期，却也是游侠从私剑之侠向道义模式过渡的社会转型期。那时，游侠已经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拥有比朝廷命官更大的影响力。武帝意识到了江湖势力对他的政权的威胁，便强迫豪侠们离乡背井，集中到天子脚下的关中接受控制。但此举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反而激活了关中一带的豪侠风气。于是，武帝害怕了，赶紧采取第二步措施，举起屠刀杀一儆百，杀了号称“天下第一名侠”的郭解之后，游侠风气才有所收敛。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侠风逐渐消失了。

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司马迁以他的“尚气好侠”的性格，经历了他人生的重大变故。一片忠心却带来了意外的灾难。

西汉名将李陵出征匈奴，不幸与匈奴大军遭遇，力竭被俘，兵败投降。匈奴爱惜他是个人才，不忍杀害他，力图劝降，真正归顺。李陵身在匈奴，却日夜思念着报答汉室。而远在京城汉武帝却不分青红皂白，将李陵一家大小统统抓了起来。但太史令司马迁却激于义气，认为李陵投降是出于无奈，决不至叛国。不料司马迁的这一奏议，却引起了武帝的大怒，将司马迁也抓了起来，定为死罪。而此时，平日里的那些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他求情说话，他家中又无甚钱财银两，打点官吏和赎罪，结果受了“宫刑”，蒙

受奇耻大辱。这一打击使司马迁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狱中，他曾一度想了却生命，但终从先圣的不幸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后来，他出狱后，升为中书令，他决心“隐忍苟活”来完成他的一代巨著《史记》的宏愿。

身处危难之中，朝廷不仁，亲戚无情，朋友不义，他为别人打抱不平，却没有人来为他奔走相救。每当他想起当年大侠朱家解救季布的故事，心中油然生出一份对游侠崇敬和祈盼的心情。他无法不让自己的笔下倾注着对主持公道的武林侠客之士的向往和敬仰了。

正是由于他有这种经历和心情，他所期望的游侠自然别是一番面目。而他的《史记》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划时代的伟大著作。

于是，在《史记》中，他对侠进行了规范和清理。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至此，“侠”第一次有了比较明确、中肯的定义。在《游侠列传》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一定义，概括了中国之侠的基本特征。比如说：疏财济贫，助人为乐，一诺千金，不图回报，忠于知己，爱惜名誉，舍身求义，视死如归。

应该说，司马迁给侠下的这个定义是比较准确全面的。我们现在对武侠的认识基本上与《史记》的一脉相承，足见这位 2000 多年前的历史学家对侠的准确定位和具有超越时代的识见。

作为中国第一个肯定“中国之侠”的史学家，能够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的“侠”大唱赞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认

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侠，应该是“仁者有乎”，即有仁人的风度。侠者不仅仅是靠自己的武功力量来战胜对手，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份仁爱之心，靠人格力量使之屈服。

《史记》的伟大历史价值在于它的思想性与文学性都是后世文人所无法超过的一座高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且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司马迁为“侠’所下的定义和他为侠与刺客写下的‘列传”。

（四）剑胆琴心唱游侠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古代，如果文人骚客不能作诗饮酒，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古代诗歌所反映的生活面是极为广阔的。正如古代诗歌中有政治讽喻诗、爱情诗、山水田园诗、军旅边塞诗等传统一样，其中也有一个被人们所忽略了的吟咏侠客的诗歌传统。

当然，中国的侠客诗歌对游侠大多持同情态度，描写游侠一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有时略带夸张，但绝少凭空捏造。有些诗强调游侠的勇敢无畏和乐于助人；有些诗则赞美他们自由快乐的生活方式。这些诗中所吟咏的游侠、爱国志士及边塞诗中的侠士英雄，其间的界限似乎不大清晰。而且更难区分游侠与纨绔子弟。有些诗歌同游侠精神有天然的契合，而有些诗歌则不过是平庸的文学习作而已。

1. 汉魏侠风的崛起

中国古代的侠客诗在汉以前几乎是没有的。游侠出现在诗词歌赋中，最早见于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了，仅此一例而已。而魏晋南北朝是咏侠诗出现较多的时期，可谓是侠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